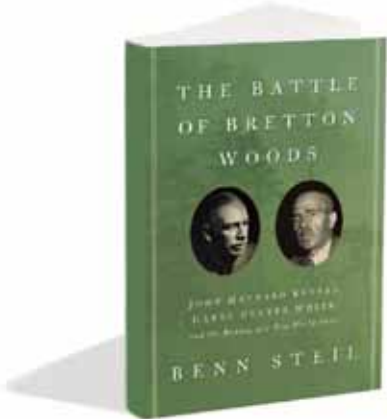


粉饰历史



本恩·斯泰尔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战斗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创建新的世界秩序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3年，472页，29.95美元（精装）。

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标志性会议，使得该旅游胜地的名字成为国际货币合作体系的同义词。虽然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但即便是其主要起草者，都不认为这是一个成功。

英国谈判代表、知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未能创建出他所预想的履行“超级中央银行”功能的IMF，深表失望。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认为，IMF在开始的几十年内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温和中介机构的角色。1970年，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爱德华·伯恩斯坦在布雷顿森林反省道：“国际货币体系并未达到最好效果”。

毋庸置疑，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回顾，应该涵盖这种对于该体系及其影响的质疑。然而，本恩·斯泰尔（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部高级研究员、主任）表

达了激进的观点。该作者详述了怀特作为一个所谓的秘密特工，不仅向前苏联传达美国的战后政策，而且（据斯泰尔所说）也为前苏联工作，将美国卷入二战。在作者的笔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确保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叫做“经济启示”这种东西的诞生，而怀特就是其构架师。

在前苏联的档案中，有充足证据显示，怀特暗中将机密泄露给前苏联情报局，虽然不可能知道究竟泄露了多少，也不知道前苏联是否大量使用。即使是同情怀特的历史学者们，大多数都承认他涉足间谍活动。但是，斯泰尔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认为怀特代表前苏联的利益，在1941年实质性地参与撰写美国外交照会，该照会包含一些明显不能被日本接受的条款，致使日本不得不撕毁协议、袭击珍珠港，从而把美国卷入战争中。

有很多理由来质疑该断言。不管是怀特本人或是财政部，都不是美日谈判的核心。在该假定的关键照会的当时，日本前往珍珠港的舰队已经在海上准备就绪。斯泰尔用于支持其论点的2002年历史事件本身，其实源于一套卷宗，而这套卷宗已被历史学者约翰·伯爵·海恩斯和哈维·克莱尔判定是造假的一套卷宗。

除了怀特的间谍活动外，斯泰尔还在书中的其他地方基于不充分证据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在讨论到货币政策时，斯泰尔提到“1914年前的金本位制，具有规范信贷价格和跨境黄金流动的自动调节机制”，并大加赞誉。这个说法虽然和金本位制可能运作的经济模式相符合，但并未基于史实体现出其实际运作方式。

即使在金本位制下，纸币仍然是主要的流通介质。发行纸币的中央银行并没有自动地遵循某种原则，根据交易流量来调节流通货币的数量。相反，货币管理当局是通

过设置利率水平来控制流通货币的数量的，而该利率的设定取决于他们认为是否可以产生足够的利润，他们的政府是否可以放心地借贷以及他们是否可以保持足够的金储备量，以对纸币转换为铸币的需求进行可靠承诺。

布雷顿森林带来的不是完美体系，而是国际协商的惯例。

也就是说，金本位制也好，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好，都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良好判断力。斯泰尔的意思是，从金本位制到布雷顿体系，进而到现代浮动汇率体制，世界从一个自动规则的时代走向了易受政治影响的全权决策时代。实际上，所有的货币体系都会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它们之间的差别来自于政治环境，而非体系或体制本身。布雷顿体系以及现在浮动汇率体制，相比起金本位制时代来说，只是受到了更多的民主政治影响。

假设，斯泰尔没有把布雷顿森林体系说成对实现“经济启示”的保障，而是说，正如该体系所构建的那样，并不能永久持续下去，那么他的观点就不会是错误的，而该书给人的感觉也会更好。根据原体系的要求，美国要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让世界公民都持有美元，同时维持每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名义兑换率，这两项都不可能持久。不过这种必然结果是该体系成功，而不是失败的标志：因为毕竟其目标并不仅是货币可兑换，而是复兴和开发。一旦世界的重建完成、变得更富有，以美元为中心的需要也就不在了。曾经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也就变成多边的体系。随着特别提款权（这是一种真正的储备资产）的建立，

IMF 开始跟凯恩斯提出的超级中央银行越来越像了。虽然，原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 1971 年已终结，但是其基于共同繁荣的利益的国际货币管理目标保留了下来，即使在这点上理论多于实践。

经济历史学者迈克尔·博尔多在对多种货币体系下的国际经济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比其他的体系（包括金

本位制）表现要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经济体享有稳定、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以及高速的增长。博尔多评论说，现代浮动汇率体制也不错，但比起布雷顿森林体系来，允许更大的本土政治自由裁量权。布雷顿森林带来的不是完美体系，而是国际协商和临时协调的惯例。这种遗产必将开启一个对于世界的货币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 IMF

将走向何处的思考。

埃里克·罗威
(Eric Rauchway)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教授
《造钱机：从金本位到布雷顿森林的繁荣创造》(The Money-Makers: The Invention of Prosperity from Bullion to Bretton Woods) (即将出版) 作者

卸下华服的银行



阿娜特·阿德迈提、马丁·赫尔维希

银行家的新装

银行业，你怎么了？我们该拿你怎么办？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3年，392页，29.95美元（精装）。

紧随着最近的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成为一个热议话题；出现了众多的复杂提案，大量的新名词和机构也把人搞得头晕眼花。然而，在阿德迈提和赫尔维希的新书中，他们对于解决过度、未受监管借贷问题的一个经典而简单的方案——提高银行资本比率——给出了强有力

的支持。

所谓“提高”，阿德迈提和赫尔维希的意思说是设定资本比率为 20%—30%，超过最近巴塞尔协议 III 中建议水平的两倍，当然还得看是怎么计算的。他们的论证对于关于资本监管的辩论是个重要贡献，不过也存在一个关键的缺陷，接下来我将会提到。

关于提高资本比率，或者说银行资本相对于其风险的比率的基本讨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如果银行的破产会对我们其他人有外在的影响，那我们就应该寻找减少这种破产和其经济影响的途径。提高资本比率，有时也叫“降低杠杆率”，是维护银行安全的合理途径。打个比方来说，由于驾驶员高速行驶过程中的过失有对行人和其他驾驶员造成严重伤害的风险，就要对高速路进行限速规定。

作者进一步阐述此原理，非常令人信服地提出：在几个方面，政府行为使银行过度风险的问题进一步恶化。首先，通过制定有利于负债，而不是产权的税法，鼓励银行间更高的杠杆率。其次，通过挽救破产银行的债权人，政府降低了银行负债的事前成本（和自由市场相比）。最后，政府降低银行破产对于经理人和债券所有人事后成本的政策，鼓励了对风险的承担。

以上论点说明提高资本比率是

有益的，因为资本状况良好的银行会面临较低的破产危险，从而减少对其他人的外在影响。不过代价又是什么呢？还以高速路来打比方，如果我们把限速降低到每小时几英里，那么不良驾驶的对外影响就非常的低了，但是代价是不可能合理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业界对于资本要求的普遍反对之声，就出于此安全性相对于增长性的论调。本书的贡献在于有力地驳斥了这种普遍意见。

反对提高银行资本的第一个理由是，减少了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从而降低了增长率。作者非常正确地指出，该意见在缺乏经济常识的人们之间极其普遍，他们混淆了“资本”和“储备”的概念，从而引起这种误解。对于银行来说，资本无非是资产负债表右侧的权益组成部分，原则上跟资产负债表左侧资产是如何投入的毫无关系。而另一方面，储备表示处于闲置状态的现金。资本和储备是不同的，不应该在此辩论中相提并论。

反对提高银行资本的第二个理由是，由于市场相对负债而言，对于产权有更高的回报要求，这样迫使银行持有更多产权，会增加银行整体的资本成本，而该成本会转嫁到整个经济体中。这显然和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不相吻合，该定理说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假定条件

下，一个企业的价值和其融资方式无关。作者非常清晰地向他们预期的（外行）读者解释了该定理背后的道理，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我本人曾很多次尝试，但都不是很成功，我计划下一次会使用本书中的一些解释。

对于本书，我唯一的批评是它过于狭隘地针对“传统”银行，而对于传统银行的监管工具已经发展得很完善了。监管者已经可以对于银行实行（至少试图试行）资本标准。但最近的经济危机是在所谓影子银行业领域开始和加速，这是

一个在证券化、购回协议和其他短期货币市场等方面都较少监管的领域。毋庸置疑，如果我们打算仅对传统银行提高资本要求，而对影子银行业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整个金融体系的更多部分就会转移到影子行业，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体系的不稳定。即使对于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小小偏离——这在实际中肯定是存在的——都会引起远离传统银行业的严重监管套利行为（实际上，经济危机前影子银行业的增长就是归咎于这种处于边缘上的监管套利）。

作者在本书结尾处确实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对于问题的规模太过小视。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所有存款都强制存放在传统银行的世界里，我们就可以只关注这些银行的安全性。但是在真实世界中有多条并行的高速路，仅对其中一条限速，只会导致其他道路过分拥挤的灾难。

安德鲁·梅特里克
(Andrew Metrick)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和管理系迈克
尔·H. 乔丹教授

铃声响于 变化中



罗宾·杰弗里、阿萨·多伦

印度电话大全

哈佛大学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2013年，336页，29.95美元（精装）。

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金融公司宣布，移动电话网络是“一部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机器”。在本书中，一位历史学者和一位人类学者阐述了电信产业对于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是一本适合学生、社会学者和商业管理者仔细阅读的重要著作，而且任何对于变化本身及变化带来的对发展和复杂社会造成的影响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阅读本书。

作者证明了官僚和政治领袖试图抵抗、阻碍或者控制强大电信主宰力带来的变革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

这一点在印度、美国和欧洲当局对3G技术频段进行高额拍卖的尝试中得到了印证，这是一种阻碍和推迟对于下一代无线技术4G和LTE的引入及投资的错误行为。有一些意见认为，政府有责任将此种业务的收入最大化。然而，如果在一种短期收入最大化的尝试中，政府降低了运营商快速而及时地对新技术进行资本投入的能力，将最终损害到社会利益。可供投入的资本原本就不足，而过度地榨取运营商会形成阻碍和延迟，并将最终增加消费者所付出的成本。一个随着时代应运而生的理念是不可阻挡，也不应该被耽搁的。

杰弗里和多伦决定聚焦于印度，这里移动电话的传播发展之迅猛，超过了世界任何其他地区，而且其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使

研究能更令人满意和更有成效。然而，印度的经验教训并不仅限于这片广阔的次大陆。在印度各个不同区域市场的众多运营商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对于我自己的公司Digicel来说，在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如海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的完全不同的市场也遭遇过。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拥有异乎寻常的多文化的巨大市场，全国有超过800种完全不同的方言，仅隔几百码的村落间大批的男女老少互相不能进行语言沟通。这是一片道路状况很差，甚至有的地方完全没有道路的荒凉土地，这使基站的建设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就像在本书中所描述的印度巴帝电信（Bharti Airtel）一样，需要正确获取市场信息，为手机和SIM卡开发预付计划和合适的分发模式。

正如印度那些成功的运营商，我们没有把运营国家的目标市场局限在富裕群体和区域上。通过与政府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快速渗透到这些国家最艰苦的地方，比如牙买加的蓝山（the Blue Mountains）、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the Highlands）以及海地的边远农产区

域和物质匮乏地区。

同时，正如作者所指出，廉价的移动电话成为穷人能够大幅度提高生活品质、创造谋生机会的一种武器。然而，如果没有印度运营企业的创业热情，这种改善就不会发生得那么迅速、显著和有效。他们的市场开发水平和技术能力所付出的对象是一群在此之前没有机会发挥自身潜力的普通大众。

这些运营商意识到，电信是大众的技术。截至2007年，印度的移动电话行业在电信服务领域雇佣了250万名员工，不包括从事维修和二手买卖的那些最具创业和创新精神的工人。

这个变化繁荣了广告和市场公司，给软件开发者带来更多机会，也为那些以前从未有此种机会的人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让他们能从事到无线电规划设计和基站建设这样的行业中。

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论及电信

服务的消费模式，也印证了我们的自身经验。我们发现，萨摩亚和印度喀拉拉邦的渔夫对于移动服务有相同的使用方式，他们为海上勤务

廉价的移动电话成为穷人能够大幅度提高生活品质、创造谋生机会的一种武器。

的伙伴提供捕捞后登陆的最佳港口的信息，提供天气状况的信息，进行紧急情况下的求助呼叫，还共享某特定时间最佳渔场的信息。无论是在印度、牙买加，还是在海地，小型制造商都通过移动电话服务，加强了他们跟市场的联系，更容易获取市场价格，从而更具竞争实力。


书中有个章节谈到关于廉价移动服务对于女性的影响，那些前景恐怕过于乐观，因为在这个国家，由于文化背景的原因，在这方面的转变是缓慢的。作者描述到廉价移

动电话具有特殊的效力，能给穷人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正如他们所说，这种趋势是“不可预期，但是值得观察和研究的”。

作者补充道，本书八章中的每一章都可以作为一本独立的书来阅读。他们说得很对。他们非常成功地做到了撰写这本书时的初衷——“兼具学术性、悦读性和通俗性”。

丹尼斯·奥布莱恩
(Denis O' Brien)

Digicel 集团主席、Frontline (人权捍卫者国际保护基金会) 主席和创始人之一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Robert Mundell, Arvind Panagariya, and many others.

A 14-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 three-month capstone internship at the World Bank, IMF, or other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 institution

The 2014–2015 program begins in July of 2014.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5, 2014.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www.sipa.columbia.edu/academics/degree_programs/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